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经学史十讲/朱维铮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10

(名家专题精讲)

ISBN 7-309-03363-9

I. 中... II. 朱... III. 经学—历史—研究—中国
IV. Z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2714 号

名家专题精讲

中国经学史十讲

朱维铮 著

小引

经学在中国很古老。倘若将公元前一三五年西汉帝国当局宣称“儒术独尊”视作起点,倘若将一九一二年民国临时政府宣布“废止读经”看作终点,那么以不同形态相继君临中世纪列朝统治学说领域的经学,已经走过了两千来年的漫长旅程。

经学史在中国却很年轻。即使从晚清初具近代史学观念的维新人士的所谓经学论著算起,到上个世纪末,这门学科的历程,也只是一百多年,况且它的生存还倍历坎坷。

人所共知,民国八年爆发的“五四”运动的斗士们,曾赋予运动一个任务,唤作“打孔家店”。历史表明,对于中世纪经学诸形态的逐个批判,早在十七世纪中叶已提上学术研究日程。这一取向,曲折隐现于全部清学史。随着晚清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潮日趋高涨,到清末已出现群言交攻孔子场景。“五四”那班新青年们,还在“洪宪帝制”锣鼓敲响之际,便已声称孔子与董仲舒实为“筹安会”的政治先驱,可知“打孔家店”与清末否定孔子思潮的直接联系。

虽然清末民初的激进学人,自以为将孔子与经学一起攻倒了,但正如民初南社一位诗人悲吟的,“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换得假共和”,那表征之一,显然在于帝制复辟、军阀专政总以恢复“读经”为先导。

于是可以理解,为什么“五四”余波未平,当年集合在《新青年》、《新潮》旗下的一批年轻学者,或致力于古史辨伪,或转向于经学史研究。关于后一点,我在《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的后记《中国经学史研究五十年》一文中,已尝试通过范型分析予以考察。

作为周予同先生于一九五八年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开始系统讲授“中国经学史”的首届学生,作为周予同先生于一九六一年起主编大学文科教材《中国历史文选》的主要助手,我对周先生研究中国经学史的动因、思路、体系和见解,不能说不熟悉,却在那些年里没有起过涉足这门学科的意愿。

这并非由于我对经学史不感兴趣,而是以为术业当专攻,此前我已经将中国土地关系史定作专业方向。没想到专家没有做成,凶猛的文革风暴就首先摧毁了史学领域,我也终于被抛入“牛”群,由囚徒又变成“监督劳动”对象。在被由一家工厂赶到又一家再一家工厂的那些岁月,前路茫茫引发的无尽苦闷,使我唯有遁入经史旧籍,以熬过一个又一个不眠的黑夜。

岂料那些年,不知读书尚有何用,但为读书而读书,反而从所谓经传经解及正野诸史的逐卷通读的过程中间,发现了以往为教书作文而读时熟视无睹的众多历史疑难,并引发沉思。当然,借书解忧只是幻想。窗外日夜嘶吼的各派红卫兵的广播喇叭,时时提醒恶斗仍酣。所谓专案组的不断审讯,包括“周予同专案组”,也视我为周先生“三反”言行的主要知情人而不停骚扰(可看我的《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前言),更总在告诫我面对的现状多么可怕。

于是,一个疑问也随之冒出来了:五四运动过后,周予

同先生曾著文指斥经学已成“僵尸”，胡适也曾借用西方汉学家的说法，宣布“儒教死了”，果真如此吗？

疑问总在脑中萦绕，也就使我常常想起百年前马克思的一段名言：“除了各种近代的灾难，还有一系列过去遗留下来的灾难在压迫着我们。这各种灾难，是由古旧腐朽生产方式的残存，以及跟着起来的各种不合时代要求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引起。我们不仅为生者所苦，而且也为死者所苦。死者捉住生者。”（见《资本论》初版序，据郭大力、王亚南译本，文中重点是原有的。）这是不是答案所在呢？我不知道，但知道历史的问题只能由历史本身予以说明。

那场风暴总算成了气旋，我也总算恢复教职。虽然作为人文学者最好的年华已经消逝，但我还是希望不虚此生，开始探索从孔子到康有为、章炳麟那一串“死者”，到底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中间，各自留下了怎样的痕迹。其中便涵泳着属于经学史的无数课题。我的职责首先是教书。既然从业方向已转移，开设的课程自然包括中国经学史的导论或专题研究。

用不着重提中世纪的经学遗产多么庞大。从经学史角度审视这笔遗产，不能拒绝利用百余年来累积的研究成果，也不能陷于因袭；不能没有思路、方法乃至体系的突破，也不能沦为臆断。近年海内关于经学史的专门论著，数量日增，内容呢？恕我直言，多半属于陈陈相因，一“陈”在于述史了无新意，二“陈”在于论史重弹反右以来纲举目张的老调。有的似乎力求创新，但令人读后只能感到论者存心“自我作故”，仿佛经学史研究从其人其书才刚开始拓荒，乃至全书既不提百年研究史，也不列参考文献。于是，我在讲授

经学史过程中,总想发现可供研究生参阅的新出论著,到头来还是只好请他们去看清末民初的那些论著,如廖平、康有为、章炳麟、皮锡瑞、刘师培、崔适、钱玄同、周予同、范文澜、钱穆、马宗霍,以及并不以经学史有特见著称的梁启超、胡适、顾颉刚等的旧著。尽管我以为这些旧著,经常显示卓识与偏见共生,特色与谬说并存。

需要说明,海峡彼岸的经学研究从未中断,引人注目的硕果累累;日本汉学界于经学史的多种专著,虽给人重叙述轻创见的印象,但在从矛盾陈述中清理史实方面,也可资我们参考。至于近年号称于中国经学史有独创见解的某些外人著作,在我实在不敢恭维,以为只好称作增增。

从事中国经学史研究,绍述前人固然是继往的前提,突破旧说也当属开来的起点,但任何个人要想在这门学科有所建树,起码有三件事要做。一是必须重新考察相关历史资料,二是必须重新论证可作研究出发点和依据的基本史实,三是必须就史论史地剖析经学史行程中的形态差异及其内部联系。很可惜,近四分之一世纪里,我还没有发现一面从事经学原典的校勘整理,一面选择若干关键课题力求复原历史真相,同时也针对这门学科的新旧传统陈见,尝试作出合乎历史的说明,这样的新著曾在大陆出版物中出现。

我不敢自诩经学史研究在总体上已度越前贤,却以为关于这门学科的定义、角度、考史及通说诸方面,已刊诸文似非未见。由于拙文以往多散刊于过度专门的载体,缺乏接受更多读者批评的机会,因而屡经犹豫,接受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建议,选择若干篇向读者求教。

本书是我关于中国经学史的论著,首次结集。按照复

旦大学出版社的设计,收入本书的论文限于十篇。感谢陈麦青先生和廖梅女士,他们已经先期确定选目,使我只能遵命校阅。

在校阅中,我做的事,一是稍事修改,主要是统一辞汇,二是补列子题,三是删削可有可无的若干字句,四是添入若干属于题中应有之义的文字。修改以附录选读文献提要较多,个别篇目作了重写。

2002年9月19夜

目 次

小引	1
----	---

1 简说中世纪中国经学史	1
——过程、特征与文献	

2 中国经学与中国文化	7
经学、儒学与孔学	8
儒术与经学	10
有一以贯之的传统么？	13
周孔与孔颜	17
怀疑经学与孔孟之道	21
尊信与不信	24
赘语	29
附释	30

3 从文化传统看中国经学	39
传统与儒学不是等价物	40
不存在单一型的儒家传统	41
也没有不可分解的文化传统	42
现代史上的三种传统	43
如何理解制度化的儒学	44
怎样诠释中国经学诸形态	47
一点希望	48
附释	50

4 中国经学的近代行程	53
解释清代经学史的一个关键	54

由近及远的怀疑与否定	56
经学内部的异端思潮	58
难以遏制的瓦解态势	60
走向“山穷水尽”？	62
附释	63
5 儒术独尊的转折过程	65
常识引出的疑问	66
时间记录的矛盾	67
西汉儒术的先驱	71
学老子者面临挑战	75
推尊儒术的重大挫折	78
罢黜黄老取得成功	81
赘语	84
附释	85
6 《论语》结集脍说	97
《论语》是唯一可信的孔子史料吗？	98
谁是《论语》原始结集的主持者	99
原始结集本的“失踪”	102
西汉的三种传抄本	106
张禹和《张侯论》	109
郑玄和《论语》今本定型	114
附释	120
7 汉学与反汉学	125
——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 和方东树的《汉学商兑》	
正负两面的“清学”挽歌	126
自成特色的扬州学派	129
“汉学师承”的陈述矛盾	132

汉学家蔑视桐城派	137
江藩述宋学抑南扬北	140
《汉学商兑》的价值	142
方东树骂汉学“六蔽”	146
没有算清的两套总帐	150
附释	153

8 晚清的经今文学 163

清前期的“帝学”	164
孔广森和庄存与	166
改变汉学的尺度	168
“凭藉经义以讥弹时政”	170
“以复古为解放”	172
“破乾嘉之门面”？	174
戴望与廖平	175
康有为和皮锡瑞	178
清亡前的变质与变形	181
附释	183

9 重评《新学伪经考》 191

早期的乌托邦设计	192
康有为这个人	193
廖平与康有为	196
《伪经考》成书	198
《伪经考》的逻辑和意向	200
朱一新驳《伪经考》	203
《伪经考》仍待研究	204
附释	205

10 中国经学史研究五十年 211

——《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后记	
周予同和中国经学史	213

经学的分歧与分派	219
孔子问题的真相	223
经的次第和经的幽灵	227
经宋学与朱熹	231
今文学和新史学	239
经学史研究的曲折道路	244
附释	252

附：中国经学史选读文献提要 257

1 《尚书大传》	258
2 《韩诗外传》	260
3 《春秋繁露》	261
4 《大戴礼记》	262
5 《六艺略》	263
6 《白虎通义》	266
7 《五经异义》	268
8 《周易集解》	269
9 《春秋集传纂例》	271
10 《七经小传》	273
11 《周官新义》	274
12 《大学衍义补》	276
13 《尚书古文疏证》	280
14 《孟子字义疏证》	281
15 《汉学师承记》	282
16 《经义述闻》	283
17 《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	285
18 《今古学考》	288
19 《孔子改制考》	290
20 《经学历史》	292
21 《国故论衡》	294

简说中世纪中国经学史

——过程、特征与文献



经学是中
世纪中国的统
治学说。

“经”变成了
唯指儒家学派尊
崇的所谓孔子亲
授的五类或六类
（“六经”即五经
加《乐》）著作的
专称。

公孙弘将
博士官由顾问
官变成教育官。

经学是中世纪中国的统治学说。

公元前二世纪晚期，西汉帝国宣布“独尊儒术”，设置“五经博士”开始控制候补文官的教育和考试等权。那以后相传由孔子撰定的五类著作——《诗》《书》《礼》《易》《春秋》的若干传本，获得帝国统治者相继认可为儒术的教科书，所谓“立于学官”。

于是，原属纺织工艺的古老概念的“经”，便由早先诸子学派都可用来比喻某种纲领性的学说或文献的通称，变成了唯指儒家学派尊崇的所谓孔子亲授的五类或六类（“六经”即五经加《乐》）著作的专称，而且是必须得到在位君主认可的那些圣经的专称。

然而，西汉武帝批准设立博士官传授的五经，都用秦统一文字后通行的“今文”写成，就是说均属汉初相国曹参废除秦汉间实行了二十年的“挟书律”以后才问世的新写本，也许只有《周易》例外。

问题在于共同尊崇孔子的儒家各派，对于五经，不仅各有诠释，而且各有传本。汉初图书解禁后出现的今文经典，都与不同师承的诠释即“传”相附丽，“一”经“常有数”“传”，例如今文《诗》便有齐鲁韩三家传。同时，民间还不断出现“古文”即非官方通行文字写成的经传。例如《尚书》的古文本，篇目文字都与今文本有很大差异。汉武帝同意他的丞相公孙弘将博士官由顾问官变成教育官，使培训文官的官方教育变成儒者的禁脔，而“五经”的文本和诠释又限于特定的今文经传，于是所谓经学的内部，以今古文争立学官为开端，出现冲突便是不可避免的。

从秦帝国建立到清帝国灭亡，朝代更迭虽多，政权分合

虽频 ,共同的统治形式都是君主专制 ,因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共同的关注焦点便是如何保证这个专制体制稳固与扩展的“君人南面之术”,在西汉中叶后即司马迁首先揭示的“以经术缘饰吏治”。

关注焦点便是“君人南面之术”。

历史表明 ,自从儒术独尊以后 ,中世纪中国占统治地位的经学 ,便以学随术变为主导取向。官方表彰的经传研究 ,总在追随权力取向 ,论证经义具有实践品格 ,所谓通经致用。但通经标榜的是阐明孔子的基本教义 ,所据经传又充斥着关于历史的矛盾陈述 ,要使其化作粉饰或辩护现行的“君人南面之术”的信条 ,需要不断重新诠释并在“致用”上出现歧见与冲突 ,当然必不可免。

中世纪中国占统治地位的经学以学随术变为主导取向。

中国的中世纪史特别漫长是事实 ,但绝非黑格尔所武断的 ,中国传统文化在理智活动方面是停滞不前的 ,所谓“两千年以前在各方面就已达到和现在一样的水平”。即使形式似乎最少变化的经学 ,究其历史形态 ,也总在或隐或显地不断更新。至迟在十八世纪 ,学者们便指出传统经学存在着汉宋两大系统 ,并从历史角度探寻经学在时间上的变异过程 ,乃至钦定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于经部总叙也强调西汉以后两千年“儒者相沿 ,学凡六变”。那以后 ,继续展开的经学原典考证 ,从音韵、文字、训诂、订补、校勘、辨伪、辑佚等角度 ,愈来愈多地恢复今古文诸经传的历史概貌及其材料来源 ,从而为清末以来的经学史研究准备了文献基础。

传统经学存在着汉宋两大系统。

尽管如此 ,从史学角度清理这份庞杂的经学遗产 ,依然困难重重。最大的困难 ,非但在于经学史料的数量可谓汗牛充栋 ,而且在于经学史的整合性研究所必须的分解式研

经学史的整合性研究所必须的分解式研究十分贫乏。

究十分贫乏。有的专门研究,如《毛诗》《周易》的论著甚多,却偏于文学或哲学,而关于《易》的经传阐释,甚至常常令人感到那是在复返纬讖式的神秘主义。从中世纪统治学说史的角度清理文献,以期通过体现时地人事诸特征的相关著述,历史地再现中世纪经学的文献行程,在目前更有必要。

《传世藏书·经库·经学史》书目的选择便基于以上认识,所选择的二十一种著作,大致属于不同时代不同形态的经学代表作。有几点需要说明:

第一,从孔子到孟荀的原始儒学遗说,没有入选本类。

这是因为本类选目的尺度在于经学史,它的文献的正式开端应为西汉伏胜《尚书大传》。

第二,从“五经”到“十三经”的历代官定的传本及注解,也没有入选本类。这是因为《传世藏书》已将清刊《十三经注疏》另列为经类。同样,表征经宋学历史行程的主要著作,例如朱熹的《四书集注》、胡广的《四书大全》等,也因别有所处理而不入本类。从经学史的角度来看,以上著作应属历代统治学说的直接陈述,不选入本类不等于否定其历史地位。

第三,从经汉学到经宋学的要籍很多,入选本类的作品,限于相关时代在学与术两方面具有承前启后或推陈出新的实际效应的著述。某些备受后人推崇或非难的论著,也因此不被编者看作其同时代的经学形态的历史表征。

第四,从西汉经今文学、东汉经古文学、南北分立的通学,到取南补北的唐学,在经典研究上变异较多,因而入选三类的有关著作也较多。相形之下,经宋学系统内程朱与

经学史文献的正式开端应为西汉伏胜《尚书大传》。

不选入本类不等于否定其历史地位。

入选本类的限于相关时代在学与术两方面具有承前启后或推陈出新的实际效应的著述。

陆王两派学说,哲学意义都胜于政术意义,其主要论著也已归入别类,因而入选本类者仅限于在唐宋间经学更新运动中有转捩作用的陆淳、王安石、刘敞等人的论著,以及用朱子学论史论政并在明清科举制中长期作为策论教科书的《大学衍义补》。

在唐宋间经学更新运动中有转捩作用的论著。

第五,从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的近三百年间,经学研究出现了由近及远地否定传统经学诸形态的“倒演”过程。其间有众多学者对于澄清中世纪经学史作出过重大贡献,例如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乾嘉间吴派考证学中坚惠棟、钱大昕,嘉道间提倡帝国“自改革”的先驱洪亮吉、龚自珍,以及清末否定中世纪统治学说甚力的夏曾佑、宋恕、刘师培等。但他们的论著,或过泛,或过专,或别入他类,均没有入选本类。但希望本类所选从阎若璩、戴震到皮锡瑞、章炳麟的论著,有助于经学史这重要一段即清学史的再研究。

希望本类所选论著,有助于经学史这重要一段即清学史的再研究。

本类的选目是否有当,校点是否审慎,均待方家批评。《传世藏书》主持者决定全书改用简化汉字刊行,在古籍整理方面虽非首创,但全面应用于传统所谓经史子集四部旧籍的重刊,则无疑属于巨大的试验。作为经学史类和先秦—五代诸子类的主编,我以为试验是可以的,有利于已对繁体字和文言文恍如隔世的青年学人直接阅读旧籍,但作为传统文化研究的从业者,目前所见的效应还不足以使我放弃关于简化汉字可能造成有关文本的误解的疑虑。因此,入选本类的原著,倘有版本选择不当、句读标识有误等问题,理应由我负审阅不周之责。但繁体化简体,异体古体化通行简体,则屡经复校而仍然有碍于理解原典本义,则可

改用简化汉字刊行属于巨大的试验。

能属于试验有待深化的启迪。

一九九六年农历丙子白露于复旦

[本篇是我主编的《传世藏书·经库·经学史》的整理说明,原载 1997 年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印行的该书卷首;现改今题。]